

【论 文】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探讨

——以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解析为例¹

孙 勇²、 王春焕³

摘要：李安宅先生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了“边疆性”概念，并且认为经过一系列的边疆社会工作，可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这个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创新，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学术探究意义。对于李安宅的“边疆性”与如何消解“边疆性”的命题，曾经在中国大陆学界学人中引起过一定的关注，但随之未能引起广泛的讨论。对所谓的边疆性进行解构，应当对应地看到现代性即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早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缺乏这种依靠科技而持续进步的地区则呈现出边疆性来，民国时期的所谓边疆在相对意义上是落后地区的代称；只有进行对比的双解构，才能得出何谓边疆性，何谓边疆性逐渐消失的结论来。人们今天探究“边疆性”这个概念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那个时代时代中国学人对边疆研究关注的缘由，有利于我们今天边疆学原理研究的进行，有利于现今中国新边疆观研究得其学理构成的启发。因而，“边疆性”的内涵还未被学界充分认识，这个命题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关键词：边疆研究；李安宅；边疆性；现代性；边疆理论

一、边疆性是边疆研究中一个值得探究的概念

近现代中国发生的三次边疆研究高潮，^[1] 都是与国运紧密联系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烟的笼罩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惨绝人寰的侵华战争，中国再次面临国家与民族存亡的巨大危机，“救亡图存”的任务又一次摆在国人面前。学界继清末兴起抵御列强为主要目的的边疆研究之绪，在更大范围内显示出超常的学术热情，边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也进一步拓展，各地陆续建立了有关研究机构和创办相关学术刊物，有的机构与刊物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2] 后有学者对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作检索，认为那个时期全国涉及边疆研究的机构众多，刊物也达百种之多。^[3] 可以认为，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人员以学为国，形成若干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4] 当时的一些大学社团和学者受“西学”影响，将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史学、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乃至地质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的研究方法运用在研究中，收获颇丰。对照清末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时，研究者多在史地研究方面浸润且研究方法不多的局面，在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的研究者，借助“西学东渐”之功，将大量现代学科引入研究，更具有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在此期间，有的学者能够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提出研究的目的，创新了一些边疆研究的概念。例如，吴文藻、杨成志的边政概念，其新的内涵外延当时得到学界与政界的公认。还有李安宅在其专著中提出的“边疆性”也是一个新概念，具有新的内涵与外延。需要说明的是，几十年之后袁剑在 2010 年所提出的“边疆性”概念，^[5] 与李安宅在 1944 年所说的“边疆性”表面上并没有顺承关系。袁剑的“边疆性”明确的是在清代中国的国家战略问题下的概念，即“指在清代中叶以后才出现的一种对中国自身边疆问题的多角度的、具有反思性的整体性操作战略。”限

“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制宪国大’”，中央民族大学博士论文。

¹ 本文发表于 2019 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 2 期，这是作者提供的原稿。

² 孙勇，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西藏民族大学硕士生导师。

³ 王春焕，西藏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于本文论述范围,对袁剑的论题将另行文讨论,凡与李安宅学术无顺承关系的其他学者提出的“边疆性”概念也略过不论。

著名学者李安宅,生于河北省迁西县洒河桥镇一书香世家,自幼便有优于一般家庭的教育条件,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从中文开蒙到接受“新学”的学业。1926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曾多次出国学习交流,在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语言学等方面都有造诣。广泛参加过中国边疆实地调研。1941年任教于华西协和大学边疆研究所并负责该所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政策研究室工作,进藏后在昌都、拉萨等多地任教,后返回内地参加西南民族学院教学活动。1963年任教于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英语并整理其旧作。其在学术生涯中所做的贡献巨大,所提出的观点至今依然对边疆学术研究有着很大的影响。李安宅是民国时期的“华西边疆学派”^[6]的中坚,也是这个学派后期的领军学者和代表人物。^[7]中国大陆学界中也有将其归到燕京人类学或华西派人类学学者之列的。

从《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8]《李安宅与华西派人类学》^[9]等文献资料中,可以大约看到李安宅与当时从事边疆研究的学者们多有交集,与陶孟和、顾颉刚、吴文藻、罗忠恕、张逢吉、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等人多有来往,也与林耀华、柯象峰、徐益棠等人有学术交流的过往。李安宅对吴文藻等人倡导的边政学(边疆政治学)持支持的态度,也与顾颉刚等学者有着“裨补民族复兴之工作,俾尽书生报国之志”的相同追求。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及其部门的西迁,有一批大学随之迁到西南后方建校,落地之后便陆续开展了各项教学与研究,其中迁建的华西、齐鲁、金陵、金陵女子大学等校,在成都继续进行边疆研究并组建有关研究机构。1941年,这几所大学发起成立的中国边疆研究学会,成为当时迁建学校中在边疆研究上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10]20世纪40年代初,以边政研究作标志的中国边政学会,编辑并定期发行综合性刊物《边政公论》,对中国边疆研究与普及等方面的工作大有促进。李安宅本人为《边政公论》创刊号撰稿,以及之后多次在《边政公论》上发文,均以少数民族地区的边地研究为内容,具体介绍了他本人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见解。

华西协合大学于1941年聘任李安宅为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次年该校组建华西边疆研究所,由校长张凌高兼任华西边疆研究所所长,李安宅任该所的副所长,但实际主持该所的研究工作。李安宅多次深入到中国西部藏地调研,经多年积累,其撰写集结成的《边疆社会工作》专著于194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重版。从那时起到现在,仅在这个命题上看,李安宅系国内第一个提出“边疆社会工作”的学者,也是第一个将“边疆性”与“消除边疆性”命题同时作论证的学者。李安宅在该书中明确提出:“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在边疆性之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11](PP.79-80)}

李安宅认为边疆的“边疆性”之所以能够逐渐消失,在于:“由着我们的协助,促动边民的自助,而使边疆工作者成为一般的专业工作者”,“到了那个时候,便不是边疆工作,而是各种的专业工作,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再不必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11](PP.79-80)}简而言之,在如此这般的过程之后,“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了。以今天的学术研究视野和方法回望,李安宅所说的“边疆性”不宜简单地归于“社会工作”的范围,似应有着较深的含义。从笔者的角度看,其“边疆性”究竟是对边疆的一种地域性社会状态的描述?还是对边疆工作(具体到社会工作)内容与性质的一种框定?或者是对依附于边疆问题上诸多对策的归总?甚至是在哲思之后对边疆工作涵义所做的意味深长的揭示?这需要通过一系列的分析后才能得出结论。由于这个概念涉及到当时国人对边疆属性的认识,也涉及到后人边疆研究的视角,包括今天我们是否需要打破边疆研究的某些窠臼,推进边疆研究理性的新认识,因而“边疆性”这个命题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二、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的边疆属性认识

边疆性概念，是人们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有一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认识过程。综观民国时期的中国学界，受当时外国学者（尤其是在华传教士学者）的影响。例如澳大利亚人叶长青（J. H. Edgar）是中国内地会的外籍传教士，他在20世纪初来到华西地区活动，曾多次前往康定、理塘、巴塘等地考察，将这些地方视作中国的边疆。1922年3月，一群来自英、美、加国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成都华西协合大学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史称“华西边疆学派”，对后来的国内学者影响很大，1930年初学会开始吸纳中国学者加入，开启学会本土化进程。40年代中国学者成为学会学术研究及组织机构中的主力，展示了学会本土化发展趋势。著名学者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玉文华等人是“华西边疆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参见周蜀蓉《基督教与华西边疆研究中的本土化进程——以华西边疆研究学会为例》，《四川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确定以少数民族地区为“边疆”的观点以至于滥觞，即多数学者乃至文人把少数民族居住地等同于“边疆”，无论是处于腹心地区还是边缘地带，只要杂居或聚居有少数民族，都谓之以“边”。例如著名文学家（也是历史文物研究家）沈从文的作品《边城》，就取材于中国腹地川湘交界的土家族、苗族与汉族杂居的地区，即是明证。抗战胜利之后，有边疆研究学者重复李安宅的研判：“边疆所以不与内地相同的缘故，就人为条件而论，不在部族，而在文化。”^[12]李安宅在其他人奢谈中国陆疆之“边”时曾明确指出，“国人之谈边疆者，多系指文化上之边疆，非国界上之边疆。如东南各省以海为界，本即国界，而吾人均不视为边疆，川甘青康地在腹心，反称之为边疆，诚以农耕畜牧之不同，乃正统文化与附从文化之所以分也”。^[13]李安宅本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所做的研究基本上就在“川、甘、青、康地腹心”，自己也是在这些地方的研究中提出了消除“边疆性”的命题。这样似为悖论的现象为何能够产生，并且延续至今，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尽管民国时期没有进行官方正式的民族识别活动，但在民间对族群的“我识”与“他识”是广泛存在的，其中又多有歧视性的称谓，学界、政界多次提出要纠正族群之间的识别用语，取消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并且在政府行为中首先在学校教育和书籍出版中得到施行。^[14]在这一时期的学界，对是否实行民族识别众说纷纭，多数人倾向于不搞或不宜搞民族识别。杨成志直截了当地提出“同生长于本国领土内之人民，均是中华民国国民，在理论上，实不必有民族之区分，况值此大中华民族正处危急存亡当中，更不宜有汉、满、蒙、回、藏、苗、夷界限之划分”。^[15]可能有“因为当时的民族问题很敏感”的因素，各界都尽可能不以“民族”为题去探讨相关的学术问题。^[16]民国时期以“边地研究”代“民族研究”逐渐成风，从事对“川边”“藏边”“滇边”等民族调研的学者数不胜数，眼界以及研究工作几乎集中在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

囿于当时的视域，中国海疆问题少有人研究，尽管早在1903年，梁启超胞弟梁启勋的论文《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前途》中提出了中国海疆与中国命运的关系，“海权”问题引起了部分学者与社会贤达的关注，但在陆疆问题研究上的著述依然较多。1928年，林子贞的《海上权力论》引起了政界、军界与学界的关注，随之做海军军事对策研究的人增多，^[17]但当时无论是海疆研究还是陆疆研究，在边疆的属性问题上，研究者并没有也不可能对边疆现象的学理分析。在中国这样陆海地理复合体的国家，自古以来政学两界更为重视的是陆疆的缩盈，亦即十分重视国家政权对陆地疆域的控制，清代“塞防”与“海防”的争论，最终以“塞防”观点占了上风，成为国家战略的一种抉择，即是这种理念的反映（参阅史绍良、吴红松：“以地缘战略为视角解析清末海防与塞防之争”，《文教资料》2010年第20卷）。对陆疆边缘地区问题的研究始终是第一位的。近代中国第一次边疆研究高潮中，研究者们多数集中于陆疆尤其是对西部边疆的研究，^[18]至民国时期，中国近代以来第二次边疆研究高潮时依然如此。而到了20世纪30、40年代，学界集中于对中国陆疆边缘地区西部的研究，与抗日战争时期对学术相关研究的需求相符合。李安宅在当时的环境下，基于陆疆所提出的“边疆性”的命题，似是顺理成章的。

绝大多数国家以陆疆建国是人类社会的一个规律，中国自古以来也是如此。中华民国大体继

承了清朝的疆域，其时政界和学界也基本达成了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国家发展前景的共识。如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就宣布：“枢机成于中央，斯经纬周于四至，是曰领土之统一。”1912年3月11日，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孙中山的宣言书的精神相一致，提法与条款上写的更为完善，其中对当时的国家领土和议会形式均有明确的规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参议员、每行省、内蒙古、外蒙古、西藏，各选派五人，青海选派一人，其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定之。参议院会议时，每参议员有一表决权。”民国政府时期的临时约法和宣言，表明国家建构的大体原则与方向已经确立，而进一步的实践是需要时间的，以至于学界的研究需要逐步理清各个民族居住地与边疆地区关系的性质。受朝贡体系传统观点的影响，当时的学者比较通行地将一些地方称之为“苗疆”“回疆”“藏边”“川边”“滇边”，其视域被“主体民族文化之外的地区皆为边疆”的理论所限，难以与现代边疆理论接轨。时至今日，仍有学者受此影响，在论文中使用这些词汇和观念，也时有相关论坛召开学术会议。以此为观，政界与学界那时在对中国的民族和国家的认识上既有很大突破又存在一定的局限。突破，在于接受了外来的新思想，推倒了数千年的封建传统国家体制，以共和的形式建国；局限，在于“居中守边”的陆疆条件未变，对如何处理共和体制下的陆疆边缘地区的事务，无论是理论准备还是实践总结都只能如此。延伸到对国家边疆问题的研究上，这种局限性在理论研究上明显受到西方人文学科的影响，依照这些学科的方法，必然要将不同于中原地区的诸多因素纳入边疆研究之中，尤其是要对民族以及文化进行差异化的区分；有中国传统文化底子的学者，又间接地揉入了中国传统的“中心—边缘”地理文化的认识，既有“华夷之辨”的理念，又有“五服”距离感的遗存，而残存的朝贡体系意识仍在起着作用。

随着列强的扩张，英印、沙俄、德国与日本等国侵入中国，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使得国人在国土沦丧的危局中，痛感边政之重要，陆疆保底之紧迫。抗战时民国中枢机关与经济主体不断西迁，究竟最后可以坐实在何处？政、学、军各界不进行边疆研究是不行的。由此，民国时期的边疆研究无论是政界或学界，都将主要视域集中于中国陆疆的西域部分，这是由国家形势变化所决定的。

其时，迁建到四川的大学中，以边疆研究为对象的机构大多数都与李安宅的研究工作有交集。而李安宅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边疆性”和“边疆性最终趋于乌有”的命题。以后来学人细分学科法观察，看似李安宅在用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做田野调查，看似他的论文多有藏地宗教文化可以归到藏学，看似他在社会学范畴谈边疆社会工作的范围与内容可归于社会学范畴……。对各种说法作仔细分辨后，所谓“边疆性”的命题，绝不是仅用社会学或人类学抑或是宗教学等单一学科知识就能提出来的。当对李氏的学术生涯研究越加深入之后，对其提出的“边疆性”问题就越感到内容丰富。

当时学界之中学贯中西的学者众多，对边疆现象的属性认识众说纷纭，其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吴文藻提出的边疆政治属性的观点。由吴文藻、杨成志所倡导的边政学研究，针对国家解决现实问题之需，从中国陆疆的边疆地区实际状况出发，以政治作为抓手，统领历史、社会、民族、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等很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因而吴文藻特地说明“边政学就是研究边疆政治的专门学问”。^[19]杨成志具有互补性地提出了《边政研究导论——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更为具体地将边政学内容及方法进行阐释，受到学界与政界的普遍重视，边政学包括教学与培训以及实地调研的诸多实践性活动随之展开。^[20]曾经参加过吴文藻社会调查活动，又与吴氏关系密切的李安宅不可能不受到影响。从李安宅本人组织华西边疆学派实地调研的情况看，均与当时受到边政学以及边政学实践方法影响有一定的关系。李安宅以及华西边疆学派的成员，在当时的川、康、甘、青四省对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包括政教乃至英印军事活动问题等进行调研，似乎难以用民族志来概括，也超出了社会学

研究和所谓社会工作的范围，几乎就是边政学所主张的一系列实践方法的翻版。在这之中，最明显的就是李安宅直接参与了“边疆服务运动”，^[21]运用所学的知识和实践结合得到的经验，直接向当时的政府部门建言献策，这与吴文藻当时参与到政府部门的治边工作如出一辙。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即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逐渐扩展，民国时期由官方推动的边疆研究也逐渐式微。^[22]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批从事边疆研究的专家学者投入到新的实践之中。

以李安宅为核心的华西边疆学学派的骨干成员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得到贺龙（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垂询与赏识，推荐参加了张国华（时任进军西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军长）领导下的以王其梅牵头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的工作，并在之后随军进藏。^[23]有资料显示，成立于1950年2月28日的十八军政策研究室，很快就达到40多人，相继聚拢了很多熟悉康藏地理、人文、经济、宗教、政治包括军事等情况的人才。^[24]从当时撰写的《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藏人的风俗和禁忌》《清廷对西藏用兵的研究》《进军守则》《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西藏财经问题研究提纲》等资料来看，其用处在于提供给十八军和中共西南局参考，其中不少内容由中共西南局转报中共中央，并最终反映在决策中。^[25]例如，从20世纪50年代初做好西藏工作的“十大政策”到达成“十七条协议”等历史过程中，^[9]学人很容易感受到其中研究者与决策者之间相联系的纹络。

可以说，李安宅等华西边疆学派的核心骨干参加到和平解放西藏的队列之中，是很有历史意义的。他们所提供的材料和观点，在辅证西藏战略地位、西藏遭帝国主义染指等方面相当的重要，在进军西藏路线抉择、历史经验和教训总结、民族宗教政策研究、建立统一战线策略、军地财政组织建议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看，难能可贵，功不可没。^[26]华西边疆学派在进军西藏时所做的工作，既体现出边政学学派核心人物早期的主张，也直接体现出华西边疆学派多年研究的宗旨，即学为国用的目的显现在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国家战略上。从这一点看，李安宅的学术活动，包括其学术共同体所做的研究，较之于边政学学派学术共同体成员在新中国之初所形成的影响及效果更为出色——李安宅、任乃强、谢国安、刘立千、于式玉等人服务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在参与完成新中国统一大陆的历史使命之中，也实现了华西边疆学派后期核心成员从事边疆研究的初衷。而这一历史之中的一个活动片段，一个李安宅人生学术活动达于高峰之际的作为¹，似乎隐喻着李安宅自己所提出的“边疆社会工作之成功，即边疆性逐渐消失于乌有”的蕴涵。

三、近现代中国边疆性与现代性问题的解构

在李安宅那本著名的边疆社会工作的著作中，其给出了人们理解边疆性的观察点，即社会工作是边疆最主要的工作，而边疆性的问题就体现在社会工作之中，若使“边疆性逐渐消失而归于乌有”，是由于“如医药、工程师、畜牧师、工业化学家之类的工作，这些工作，只有其各行的技术问题，再不必兼为边疆而有的适应技术”。^{[11](P.80)}到这里，研究者才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李氏其实是将现代性(modernity)问题引入到了边疆性问题之中。其所谓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的工作，要依赖现代性的介入才能实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对镜像问题的互照，即边疆性是在没有或缺少现代性条件下的产物，若没有现代性的介入也就不会有边疆性的消失。事实上，从20世纪中叶到今天，中国处理边疆问题的一个底蕴却是由世界现代性的介入而铺垫的。

现代性所蕴含的内容，主要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及其观念所导致持续进步的社会体验，而这种社会体验打破了国家和民族的藩篱，在全世界拓展开来成为新的世界体系，

¹ 李安宅在1950年初发表了《新时代中的边疆》一文，综合其之前的研究，提出了体现其学术集大成的一些观点。参阅陈波《李安宅与华西派人类学》第六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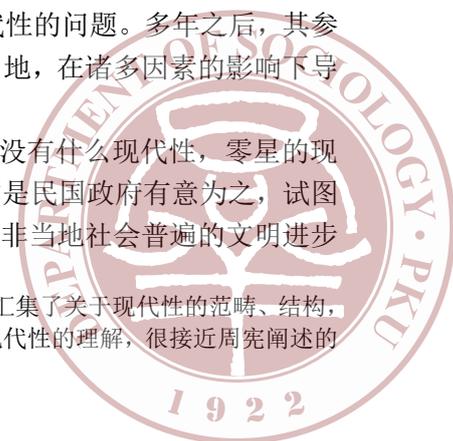
成为了各国不可逆转的一种时代观念与行动。先进生产力内在地追求文明昌盛与外在地用科技改造世界两相结合，便成了人们合目的的追求与行动。从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由此推进了 15 世纪之后民族国家的实践。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体系（Westphalian system）建立之后，各个民族国家的内容与形式在主权意识下更加牢固，为解决各国之间的矛盾和争端，一个相对合理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虽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的均势并不巩固，但确定了以平等、主权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准则，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依然是解决各国间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在这个体系之后的西方，现代性（modernity）开始产生并以加速度发展并推及到全球，在相继建立的民族国家中，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家统一的政治观念、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观念，形成了驱动社会组织机制运行的主观动力。当然，这些现代性也推动了早期强盛国家的海外扩张，包括用战争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带到了全世界。¹ 现代性因素尤其是现代性所蕴含的富强、科学、民主、平等、法治、文明进步等新风漫卷全球，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就是一股世界潮流，中国近代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告诫国人强调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于现代性所具有的持续发展的特质，各个民族国家在不同阶段，凡是追求文明昌盛与以科技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甚至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式推动社会进程的活动，都是在世界体系上现代性的体现，至今也是如此。人们所谓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体现的是现代性在一个区域社会中的扩展和普及。

如果人们从发生学的角度看李安宅的边疆性问题，那么就有一个从现代性到现代化的推进问题。20 世纪初到中叶的中国“边疆”，学界一般所指的是国家疆域陆疆西部边缘的地方，也包括与内地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形态差异较大的省级边缘地带，两者在研究与实践上的活动，也是纠缠在一起难以分开的。从这个问题的相关性视角看，从那个时代起，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疆性与现代性两者是并存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被谓之以“边”的寓意，虽然不完全同等于国家边疆，但由于多数地方具有同质同构的形态，例如西藏与相邻四省的藏地，在社会的经济、文化、民俗、生产方式等方面就是同质同构的，在不做行政区划辨析以及不进行地理细分的情况下，当时的学者理所当然的都视之为“边疆”，这是在学术研究之中亲缘性问题可以互换对象的一种现象，以至于学者们熟视无睹，遂成常例。

没有或者是缺乏现代性的边疆，一定不会有现代化，没有现代化的边疆即成为落后乃至贫穷地区的代名词，亦是边地的代名词。由此而论，李安宅所说的“边疆性的消失”，其中就有着对中国进入现代性时代的认可和赞成，在《边疆社会工作》这本书中，李氏十分明确点出的“医药、工程、畜牧、工业化学”这些职业者到边疆工作，方能够使得边疆性逐渐消失，直言说明了由于不同于以往现代科技介入到“边疆”之后，将逐渐改变那里的生产方式，进而使得中国这个较晚才实现了从封建王朝转型到民族国家的东方大国，在边疆地区通过先进生产力的引进，树立起民主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家统一的政治观念、自由和法治的社会观念，包括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并自觉地形成驱动当地社会组织机制运行的动力；最终，使得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不再谓之为“边”，亦即不再是远离繁华中心的荒凉边缘部分。而这一切，都是现代性之于边疆性所能起到作用的集中体现。只不过，李安宅先生未直接说明这是现代性的问题。多年之后，其参加进藏部队到了西藏之后，所做的工作范围有限，以及再往后回到内地，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学术研究中断乃至结束，人们再未见到李安宅后续的研究成果。

20 世纪中叶中国西部的边疆地区，较之于沿海和中部省份几乎没有什么现代性，零星的现代小学、公路、厂矿……，大多数与各地统治者的喜好有关，少量的是民国政府有意为之，试图以现代文明的器物教化民众，整备军需，打通关隘以通边陲等，而并非当地社会普遍的文明进步

¹ 参阅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第 5-7 页，商务印书馆 2005 年。周宪在此书中汇集了关于现代性的范畴、结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关系，审美现代性及日常生活批判等一系列论文。本文对现代性的理解，很接近周宪阐述的现代性认识。



所致。即使是有少量的开明人士，兴办了现代文化、经济事业之后，引来攻讦不计其数而举步维艰，致使当事人身心俱疲到后来废毁所兴办的事业。长期在川、甘、青藏地做社会学（人类学）工作的李安宅，对这种状况是非常清楚的。其所说的“边疆性”，就直接越过了一般地理上的框定，没有仅仅划定在国家疆域的边界（边境线）之内的地方，而是指向了那些与内地有差异的经济文化区域的属性上——李氏所从事的边疆社会工作（还有人类学/民族学），其底蕴其实在于现代性在边疆地区的推进，从而在生产方式的改造之后使得边疆性消失。如其所点明的那样，那些现代化事业只有落地到中国西部边疆并得到大力发展，边疆性才会逐步归于乌有。

到此，隐喻在李安宅命题之中的两个因素，对世界潮流体验上的现代性与对藏区现实感受的边疆性，有了一个可做分析的架构，即现代性在其书中是隐性的一个前提，而边疆性则成为社会学的显性问题，这两者被分析解构出来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在时代背景下考量后的答案，亦即所谓边疆性需要放到现代性命题之下，才能彰显出来。然而，问题到此并没有结束。现代性所蕴含的因素之中，富强、科技、民主、法治、平等、文明、进步等，如何使边疆性消弭，既是一个有待深入的理论问题，^[27]更是一个长久的实践问题。

随着形势的发展，进入 21 世纪学界所研究的边疆，早已不同于 20 世纪人们视域之中的边疆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国家疆域的地理边疆仅仅只是边疆形态的一部分，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边疆拓展到底土、空疆、外空疆、网络、金融等方面，实体的与虚拟的边疆在国家博弈之中遍及各个领域，边疆的特征已经难以被框定在单要素的认定之中，所谓边疆特征是与时俱进的，需要将人类社会不同阶段的边疆现象做研究之后，才有可能接近理性认可的特质表征，其中必然要有对边疆属性问题的认识。早期的边疆性问题还在随着现代性在延伸，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越过洲际和国境而产生的世界性的实践和体验，边疆性依然有着面对现代性的现实意义。

四、余论

李安宅进藏之后，基本上与曾经从事的边疆社会研究脱离了，虽然担任昌都、拉萨小学筹建主要负责工作，开办军地干部藏语文学习班等，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在做服务边疆的教育工作，可是已经不能说是学术研究了。后来，李氏还认为各个部门派出调查组所做的西藏宗教之调查，与他自己早先所做的调查“相一致”（此为李安宅原话）¹。可见其作为当事者，不可避免的有“迷”的时候，看不到其后去的调查组将西藏宗教的调查置于社会整体制度的背景下，把西藏宗教的高级僧人集团列入三大领主的行列，并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分析其政治和经济行为——这样一种较之于西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有着明显区别的调查方法以及成果，与李安宅自己早期所做的研究其实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相一致”。

李安宅在十八军政策研究室，与同仁们通过对早期藏地的系统研究提供的资料以及对策性的建议，确实对进军西藏、治理西藏有很大作用。然而，在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公布之后，一个蕴含在共和国进程之中的问题便浮现出来——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指导所建立的国家，需要在社会属性的研究上揭示出社会的制度性问题——而对这一点，李安宅多年之后也似乎没有真搞明白——新中国需要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成果，业已成为人文、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前提，在对边疆进行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领域中也是如此。

早在 1951 年 5 月，张国华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期间就见到郭沫若，提到了需要对西藏做系统深入调研的事情。“中央研究批准后，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由该委员会主任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负责统筹规划，科学院和国家人事部门负责这

¹ 李安宅：《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中国藏学》1988 年第 1 期。此文系李安宅对自己在 20 世纪 40 年代撰写的论著汉文稿丢失仅存英文稿之后，再将英文稿翻译为汉文书稿的节录，仅发了书稿的“出版前言”等三个部分。

件事的具体安排。”^[28]当年成立的进藏科学考察队中以自然科考为主，也设有社会历史组（后改为社会科学组），组长由林耀华担任。林氏在后来所著的《民族学通论》一书中，有一部分对西藏当时的社会制度、人们的阶级成份、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都有论述。这显然与李安宅早期以从美国带回的理论与方法来做的藏族社会研究，是大相径庭的。

至 1956 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组织的“西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赴藏；其后，在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领导下，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及其他单位又增派人员充实了调查组力量，从 1958 年至 1962 年深入到西藏很多地区的基层做调研；在中共西藏工委的领导下，调查组人员结合编写《藏族简史》《藏族简志》等，与西藏地方研究人员一起全面展开社会历史调查工作，陆续刊印出《藏族社会历史调查》系列的油印本与铅印资料¹，后又多次结集出版。^[29]在前后 10 来年多次的调查之中，多个小组搜集到了大量过去从未有过的以藏族为主的社会历史资料，其中有很多的资料来自于在庄园和牧场以及寺庙的实地调查，这些材料的汇集，在更高更广的学术层面上支撑了执政党和国家的有关理论以及方针政策。可以说，这样大规模的以新的理论为指导的实地调研，对于研判西藏乃至青、甘、川、滇藏地的历史沿革、社会制度等，与新中国所确立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以及宗教政策相吻合，而与李氏早期的研究已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李安宅早期的边疆社会工作留给后人的财富是相当丰厚的，即使是对其在某一个方面或某一点见解上的挖掘，我们也能发现历经时光刻蚀而依然发光的东西来，其中关于边疆性问题的探讨，就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命题。但在目前的边疆理论的研究之中，尚未引起必要的注意和给予应有的位置。

包括边疆社会工作在内的所有边疆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须久久为功。如李安宅指出的那样，是“一点一滴，经常创新的；一步一步，不求近效的；避名求实，善与人同的……”^[11]（P.18）由此，李安宅提出调研与具体工作都应该有长远的计划，且不应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其提出了“可有两条道路，一条即自中央单元化起来，一条乃由工作所在地单元化起来”^[11]（P.58）的意见，较早就给出做好边疆社会工作，逐步消除边疆性的操作路径。有学者特地指出：“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不是书本上的说教，而是可以付诸实施的具体方式方法，这也是他对社会工作之本质的理解的最好注脚。”^[30]其实，通观李安宅的边疆研究，远远超出了社会学的范畴，所做的学术贡献也不止于一般文献介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乃至美学的范围。从学科建设的角度看，李安宅应该是中国边疆跨学科研究早期的奠基者之一，其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做了跨学科的边疆研究，尽管还不是很自觉的或者说是从实用角度所进行的，但毕竟展示了多学科研究的益处，且取得了不菲的收获。

李安宅的边疆学术研究，包括边疆性问题的阐述，是具有开创性的，而这种开创性又以其学术活动向着学术界扩展，与当时吴文藻的边政学派、顾颉刚的边疆史地学派、陈寅恪的边疆学术实用研究、方国瑜的西南边疆研究等相呼应，共同为国家解决边疆问题而设谋。尤其是在新中国统一大陆的历史关键时刻，李安宅投入到时代的大潮之中，参加到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治理西藏的队伍之中，以专家学者的身份为国家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种立于松涧而放眼峻岭的见识，潺潺溪流汇于大江波涛的志向，值得后来的学人纪念和学习。研究李安宅的边疆理念和学术思想，总结其学术生涯之得失，对于边疆理论的深度探索大有裨益，至少可以用于培植今天边疆学研究中多学科跨通的学养，并在学界蓄养出做研究工作要有大格局的视域以及襟怀。

参考文献：

¹ 参阅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 2009 年。笔者在 1990 年曾收集到西藏 1959 年民主改革前后社会调查的一些油印与铅印本，可以看出当时调查的深入程度。



- [1] 厉声,“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 (4).
- [2] 林恩显,《边政通论》,台北:华泰书局,1988: 17-18, 252.
- [3] 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与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 (2).
- [4] 孙勇、孙昭亮,“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共同体巡检述略”,《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 (3) .
- [5] 袁剑,“‘新清史’与清代中国的‘边疆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10-9 (13).
- [6] 周蜀蓉,“华西边疆研究会之再诠释”,《中华文化论坛》2010 (3).
- [7] 汪洪亮,“李安宅的学术成长与政治纠结——两个版本自传比较阅读札记”,《民族学刊》2016(1).
- [8] 汪洪亮,“李安宅、于式玉先生编年事辑”,《民族学刊》2013 (6).
- [9] 陈波,《李安宅与华西学派人类学》,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10 年。
- [10] 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历史研究》1996 (4).
- [11] 李安宅,《边疆社会工作》,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2: 79-80.
- [12] 孙家俭,“两年来从服务工作中所得到的新认识”,《边疆通讯》1946 (7).
- [13] 李安宅,“实地研究与边疆”,《边疆通讯》1942 (2).
- [14] 娄贵品,“国民政府改废少数民族称谓的历史考察”,《贵州民族研究》2013 (3).
- [15] 杨成志,“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 (1).
- [16] 王利平,“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边疆和边政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12) .
- [17] 史滇生,“中国近代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演进”,《军事历史研究》2000 (1).
- [18] 王鹏辉,“龚自珍和魏源的舆地学研究”,《历史研究》2014 (3).
- [19] 吴文藻,“边政学发凡”,《边政公论》1942 (1).
- [20] 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民族学的关系”,《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4) .
- [21] 邓杰,“李安宅与边疆服务运动”,《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9 (6).
- [22] 李勇军,“时局与边疆: 民国时期边政学的发展历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 (3).
- [23] 霞飞,“贺龙与西藏和平解放”,《党史博采》(纪实) 2008 (7).
- [24] 赵慎应,《张国华将军在西藏》,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8: 29-30.
- [25]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统一战线的 100 个由来》,北京:华文出版社,2010: 249-256.
- [26] 黄可,《和平解放西藏重大事件实录》,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 37.
- [27] 黄万庭,“李安宅的边疆社会工作思想”,《中国社会工作》2012 (16).
- [28] 多杰才旦,“我与西藏的不解之缘”,《中国藏学》2005 (3).
- [29] 西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编辑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190.
- [30] 朱慧敏、彭秀良,“李安宅与边疆社会工作研究”,《中国社会导刊》2016 (19) .

